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和“两个创造”的历史观审视

陈锡喜

〔摘要〕 审视党百年奋斗主题和“两个创造”的“大历史观”,需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厘清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史范式的争议。革命史范式抓住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各大事变相继更替的本质,现代化史范式拓展了认识视野。两者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的“硬核”即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革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借现代化史范式来否定狭义的政治革命乃至广义的社会革命,或者把社会革命归结到模式化的阶级斗争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翻案,都否定或背离了唯物史观。两个范式辩证统一的实践基础,是党的百年奋斗史,其主题是民族复兴即现代化,主线是领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唯物史观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体现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互为目的和手段。

〔关键词〕 百年奋斗主题;“两个创造”;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学理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之所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有“大历史观”,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①其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一、问题的缘起:两种研究范式与唯物史观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置于整个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就须厘清改革开放以来所兴起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之争。

所谓范式,按此概念的提出者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解释,即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某一科学家共同体所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乃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准则、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信念。把这一解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 200240)。本文系教育部专项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阐释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建设研究”(20JDSZKZ01)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研究”(20JHQ001)的研究成果。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9 页。

释转换成马克思主义术语,实质就是观察事物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因此,所谓近现代历史的范式之争,本质就是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争。

中国史学界在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党史时,除“文明史”范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中,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为框架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全球史”范式(在世界交往的视角中,以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交往为主线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冲击—回应”范式、“社会—国家”范式等以外,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革命史”范式长期占主导地位。

革命史范式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当作考察历史的范式,而把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当作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三次高潮,由此相延续,继续用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斗争来概括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这一叙事范式,比较以往只是用文化或文明冲突范式的解释,更能抓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各大事变相继更替的本质,因而更具有科学性;同时它也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历史观上的意识形态支撑,因而更具有价值性。

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等文艺理论的讨论,激烈批判了离开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而空谈文化的思潮,他尖锐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②在经历一系列的文艺批判和各种政治运动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初,革命史范式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确立了它的话语权。

现代化史范式,本来是西方总结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用以解释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理论范式,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肇始于西方工业的现代化进程,是因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而使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自主化、文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等方面的发展和转变。改革开放后,因中国追补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原来只是零星冒头的现代化史范式逐渐扩大了影响,并大有成为学术界主流话语之势。其主要论点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变革,不仅仅是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并列过程,更是一个围绕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为基本脉络的历史过程。

于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事,就产生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的争议,其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部现代化史?这场争论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它不仅拓展了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视野,而且把中国近现代史更多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而使它获得更深刻的内涵。它在以下方面逐步凝聚了多数人的共识:离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法理解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何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脱离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也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革命,不能仅仅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叙事,阐述现代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框架,等等。这些共识,为融通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史范式,提供了可能性。

尽管如此,但核心问题的争论依然存在,即如果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史范式是可以相容的,那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么,应当以“革命史包容现代化史”还是以“现代化史包括革命史”?某些持现代化史范式的学者坚决认为,革命打断了现代化进程,付出了太大代价,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中要“告别革命”;而某些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以现代化史范式同唯物史观是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坚持否定现代化史范式,认为它是“以现代化史观代替唯物史观”,并且“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泛滥提供了历史观基础”,甚至“是出自敌视中国社会主义的恶势力的政治图谋需要的理论”。

于是,厘清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关系,对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主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把握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

把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认为革命史观是把历史简单化、脸谱化的观点,还是认为现代化史观是反唯物史观的,都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即都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史观了,只不过在价值判断上,前者持否定态度,后者则持肯定态度。

在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初,用阶级斗争史来解释社会发展史并以此来把握现实的社会矛盾,同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存在的君臣伦理或天人关系等观念相比,无疑是石破天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这个宇宙观,最初传入时,最主要的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曾经回忆道,他之所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深刻铭记在心中,就是在青年时代看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籍。而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确实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切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观,因而他很容易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并将之贯穿于一生的思维和实践。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照搬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思维模式,而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分析,即通过区分敌我友而得出了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所不同的结论,例如,他把马克思视为敌人的资产阶级一分为三,即买办资产阶级是“敌”、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具有两面性而可争取为“友”、小资产阶级则是“我”。这一对阶级状况进行“敌我友”的分析,在实践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因为这一分析的具体结果尽管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不同,但其思维方式(或用现代话语,则是“范式”)却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即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根据而形成的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运用,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①总结毛泽东在实践上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成功经验,以及他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审视革命史观时,需要厘清两大问题:唯物史观的“硬核”及其同阶级斗争史观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中狭义革命和广义革命的关系。

其一,唯物史观的“硬核”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向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时总结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的总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的物质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3页。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又成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建立的现实基础;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同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唯物史观原理作了概述:“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这一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被称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学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所作的“盖棺定论”,第一个发现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概述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就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发现,它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而要解释经济、政治乃至思想三大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根据、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路径和目的,均只能依据特定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基本矛盾。

人们有时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解读为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私有制,甚至有学者因此而质疑我们今天不敢亮出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大旗,背离了《共产党宣言》的“初心”;而更多学者在为全面深化改革作辩护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但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照搬到今天。于是,厘清《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对理解唯物史观是十分必要的。其实,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再版序言中,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构成《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不止一次作了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非常清晰,那就是:社会基本矛盾是说明历史的“范式”,而阶级斗争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此”。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把某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凝固不变的模式强加于特定民族的特定历史阶段,客观上背离了《共产党宣言》的“初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正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为论证基础的。他们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所推进的生产的工业化和社会化,一方面“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而“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④而发生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因社会化大生产而锻造了置资本主义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不仅如此,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现代工人,即无产阶级。

人们还常常把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线性更替”,说成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其实是教条主义的话语。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那五种社会形态的线性更替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

必须经历的共同路径,它只是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及去脉的典型表现和抽象表达。事实上,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多样化的,都有其自己的特殊性,而蕴涵在这些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任何民族在任何历史阶段产生的阶级矛盾乃至斗争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这具有普遍性;至于某一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及其对革命乃至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都有其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强调的:“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也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①“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②这意味着,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阶级矛盾乃至革命的条件,并不具有特定模式,而只有从该民族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乃至现代化进程来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必然性,才能理解阶级斗争乃至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离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来机械套用“奴隶同奴隶主阶级—农民同地主阶级—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依次更替的阶级斗争这一模式,并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最高原理,用以解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无疑偏离了唯物史观的真谛而陷入了先验论的巢穴。

其二,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革命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

“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是指改朝换代。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革命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革命,是指进步阶级夺取政权而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因而它往往被称为“政治革命”;而广义的革命,则是指广泛的社会革命或大的社会变革,它既包括政治革命,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文化革命以及生产关系乃至生产力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③“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④

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革命推翻旧政权后,并不等于革命任务的结束,还要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继续领导广泛的社会革命以推动社会进步进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党领导革命同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⑤邓小平所说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以及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二次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等等,都是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狭义革命即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更强调了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广义革命即广泛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某一时段曾经出现过所谓“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论断,其实是以西方政治学范式来解读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难道就不革命了吗?查遍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和党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从来没有用过这一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⑥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9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9—70页。

因为中国共产党还要通过进行伟大斗争,来推进伟大事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致力于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解放整个社会的活力,致力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防范和应对国内外各种更复杂的风险和突发危机,以不仅获得更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展现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从而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仅要继续领导社会革命,还要继续推进自我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①正因为如此,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②

于是,一方面,我们要抵制借现代化史范式来否定狭义的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和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的错误倾向。因为断言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革命打乱了现代化进程因而要“告别革命”,是把现代化进程视为纯粹的自然历史过程甚至是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当作所谓“普世性”道路,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根本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一讲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就回到当年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思维方式,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能全盘否定,但“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建立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③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判断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也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是把握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辩证统一的实践基础

党的百年奋斗史,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靠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对内剥夺农民和对外扩张而开辟了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因自我封闭和列强侵略带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因此,通过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在客观的历史判断上顺应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在主观的价值判断上顺应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追求,因而它体现了唯物史观在近现代中国的运用。

然而,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世界背景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列强的扶植,无疑是空想。当时许多怀着救国救民抱负的志士仁人以为,只要虔诚地拜西方为师,就能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毛泽东却问道:“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⑤因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图的是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推销产品的广阔市场,因此,无论是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的农民战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3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71页。

③《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争和改良主义,还是照搬资本主义方案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能够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而要走上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狭义的政治革命,还是广义的社会革命,都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前提。而党的百年奋斗的主题和“两个创造”,则通过党领导四个时期的革命实践而得以逐步实现。

党一经诞生,就通过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走上现代化道路创造根本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了改革开放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伟大革命,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十八大以来,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狭义的政治革命和广泛的社会革命。党的百年奋斗主题和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主线的统一,在实践中印证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百年奋斗中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是因为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时代课题。于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和“两个创造”的唯物史观审视,归根结底是把握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即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互为目的和手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对外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对内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目的是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1956年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期,他继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①同样,邓小平所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突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正如他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苏东发生剧变的症结就在于经济上不去,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没有现代化,社会主义便无法坚持和巩固;同时,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实现,是实现共同富裕,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发展差别又很大的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而搞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这样就很可能出乱子甚至打内战,那中国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中国梦这一主题,同时又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同样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相互统一的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特征的概括,特别是其中关于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论述,更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共生以及和平发展问题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才有必要和可能去解决这些人类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强国,始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将为之继续奋斗的自新中国诞生后算起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都在实践上证明了,唯物史观蕴涵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统一。

(责任编辑:邵泽斌)

The Theme in the CPC's Centenary Struggle and Its “Two Creations” : An Examination of the View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CHEN Xixi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big historical view” on the them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the “two creations” it has achieved,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underst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paradigm of a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the paradigm of a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the former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successive changes of major event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the latter expands the horizon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wo is the “hard co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mely the theory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Revolutions determined by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narrow and broad senses. It negates or deviates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use the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to deny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a narrow sense or even social revolution in a broad sense; to attribute social revolution to a stereotyped class struggle; or even to reverse the established verdic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wo paradigms is the CPC's century-long history of struggle, whose theme is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modernization) and whose main line is to lead China's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s self-r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ism; one is both the end and the means for the other.

Keywords: theme of centenary struggle; “two creations”; view of history

About the author: CHEN Xixi is Chair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of the Intercollegiat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nghai 200240).